

當西方諮商與現代華人文化碰撞時

Traditional-modern Biculture in Counseling

胡珈華¹

Chia-Hua Hu¹

摘 要

數百年來，西方文化在華人社會中的流動，已然為當今華人社會締造出新的樣貌—雙文化特徵；而在多元文化諮商的概念受到重視後，許多助人工作者開始敏感到文化對一個人心理健康和適應的影響。因此本文試圖闡述何謂雙文化、雙文化如何被發生，接著討論其如何影響諮商助人工作，並以生涯、婚姻、家庭三種諮商議題作闡述，同時羅列因應雙文化而生的新興諮商模式，包含C-U-C生涯決定模式、人我關係協調理論、含攝文化下的Bowen家族治療、結合「易經」的動機式晤談。最後筆者也提供在此主題上的建議，作為實務與學術可持續耕耘的參考方向。

關鍵詞：多元文化諮商、現代華人、華人本土心理學、雙文化、本土心理諮商

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區諮商中心心田心理諮商所心理師

通訊作者：胡珈華，（106）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5巷16號，E-mail：carol82407@gmail.com

壹、前言

近年來，諮商專業已從過去僅關注個人內在的運作，拉遠至系統觀的俯瞰，更多的研究與實務經驗累積，亦加證實一個人的心理健康狀態，是深受社會文化所影響（李亦園，1996；楊國樞等人，2010；賴樂山等人，2005；Ratts et al., 2016）。而飄洋過海的心理諮商夾帶著西方個人取向的哲學基礎，落在這片重視和諧、鼓勵容忍的華人土地上，也遇到了事倍功半的困境（洪莉竹，2002）。本篇文獻回顧，便試圖整理數位在本土心理學領域中努力的學者們之研究貢獻，除了使我們對現代華人的文化背景有更深刻的理解，幫助反思西方諮商的實踐，也探看這些困境下，創意與彈性是如何開展出兼具中西文化的諮商模式，更吻合現代華人對心理健康的需求。

貳、現代華人文化—雙文化特徵

從清末開始至二十世紀中期，香港、臺灣、大陸一線大城市已然以西方經濟體系模式運作著，時至今日的資訊化社會，教育、政治、娛樂、學術，無一不受西方思想渲染，因此要討論現今華人的文化觀，古籍上所描述的「傳統中華民族」已無法道盡（高旭繁，2008）。因此，站在身為諮商助人者的立場，去理解現代華人的文化脈絡更顯需要。

傳統華人文化是典型的集體主義，儒、釋、道三種哲學派典支撐起社會中大大小小的規範，學者整理到集體主義的特色為關連性、互依性、順應性、他律性、和諧性、從眾性（楊國樞等人，2010）。然而現代華人文化已非純然的

集體主義，而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兩種思想的並存（江曉珍，2012；洪瑞斌，2017；高旭繁，2008；高旭繁、楊國樞，2011；陸洛，2003，2011；趙君綺，2008；Leong & Chang, 2003）。

但無論是那一種傾向，兩者並存的現象已然為主要狀態，且隨著時代的推演，極端的集體主義或是極端個人主義只會越來越少（高旭繁，2008）。因此學者們建構出「雙文化」的概念，描述現代華人不同程度「現代性」與「傳統性」的並存模式（高旭繁，2008；高旭繁、楊國樞，2011）。

一、現代性

現代性的內涵包括經濟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文化教育及宗教現代化。在多元個人現代性量表中有五種心理成分：平權開放、獨立自願、樂觀進取、尊重情感、兩性平等（高旭繁、楊國樞，2011）。像是如果符合「小孩的意見與自己的意見不同時，父母應該與小孩像朋友一樣溝通，雙方交換意見」敘述，即表示有著平權開放的特性；或是「任何的會議場合，被要求或邀請公開發言，或提供意見或建議時，應能勇於發言、積極表達」則展現了樂觀進取的意涵（高旭繁，2008）。

二、傳統性

傳統性的內涵則區分成大傳統、小傳統及傳統心理特徵。大傳統指的是概念化較大層次的傳統特性，像是：人與天地關係。小傳統則是指大傳統的精神中融合進社會、家庭、習俗、文學等向度後的樣貌，而傳統心理特徵則是落實至生活情境中的行動回應。在多元個人

傳統性量表中亦有五種心理成分：遵從權威、孝親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男性優越（高旭繁、楊國樞，2011）。像是如果符合「父母對交往中的另一半有意見時，應聽從父母的建議，和平分手，並與父母認可的對象交往」敘述，即表示有著孝親敬祖的特性；或是「當他人指出家中擺設不符合風水時，此時宜改變家中擺設以符合風水。」即呈現出宿命自保的內涵（高旭繁，2008）。

三、並存狀態

兩種文化的並存方法，從1994年華人本土心理學的先驅楊國樞率先建構後，相繼的十多年，包含楊國樞本人及後繼學者，陸陸續續對其進行更新及修正。從一開始認定並存模式僅是過渡階段，終究會走入完全的現代性，到目前更傾向並存狀態會是持續穩定的新文化樣貌；而生活於此，重要的是學習如何兼容並蓄，融合兩種文化的價值（高旭繁，2008；陸洛，2003；楊國樞，1994，2004；Yang, 1996）。

討論到兩種文化會如何並存，並存的形式、比重為何，也會與個人的時空背景、人口學資料等條件形成交互作用影響，包括居住地：都市化程度越低的都市，越傾向傳統性；教育程度越高，現代性越高；年輕世代比年長世代更偏向現代性，更加重視來自個人取向成就的幸福。（王叢桂，1993；王叢桂、羅國英，2009；楊國樞，2004；趙君綺，2008；Brindley, 1990; Leong & Chang, 2003）。高旭繁（2008）亦提出的「人境互動論」，闡述不僅個人有雙文化，情境也有雙文化。如：「農曆過年」、「與長輩用餐」就偏向傳統性情

境；「小家庭中的家事分工」則偏向現代性情境，而當情境與因應行為的傳統性／現代性相符時，更有利於心理適應，如：在農曆新年時，遵守傳統禮俗吃團圓飯、優先請長輩入座；在討論夫妻分工時，講求平等討論等，則更有利於個體的生活適應。

綜合以上，可看見現代華人所處的環境中，兩種文化的並存是普遍被承認的現況，當兩者產生矛盾衝撞時，身處其中的個體如何建構自身價值觀、如何回應外在環境，都需要更多的覺察，助人工作者如果能敏感到文化對人心理健康的影響，更能推進來談者的適應能力。

參、雙文化下的諮商議題

在不同的文化價值下，看待人類的困擾議題會有不同的歸因、因應方式，以下簡單分述三種議題，了解在雙文化情境中可能會有的特性。

一、生涯

傳統中華文化看待工作的價值，因著儒家文化、家族主義的影響，最理想的是能發揮經世濟民的精神，替家族帶來財富與榮譽（王叢桂、羅國英，2009）。以臺灣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發現，父母對子女的生涯期待，會希望其工作具備無虞的經濟供應和光耀門楣的要素。而父母的期待在子女抉擇生涯時，又幾乎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標，研究指出，大學生在思考生涯時，會在獲得父母允許後才進行下一步行動（毛菁華，2015；趙育玄，2005；Zhang et al., 2015）。

而西方的生涯諮商卻十分不同。在個人主義脈絡下，會強調工作是否能幫助個人達到自我實現、找到意義與美感。因此在建構介入方法時，也會更著重在個人的內在潛力、興趣與能力的探索，而較少將家人期待、社會地位觀感納入評估（王秀槐，2015；洪瑞斌，2017）。

近年來，臺灣大學生生涯發展的研究就指出，許多青年正是在個人興趣與家人社會期待，這兩個動力之間找尋平衡，從西方發展出的生涯召喚觀點，在華人社會中，也演繹成具有權衡自我與外在平衡之意涵（王玉珍、吳清麟，2017；洪瑞斌，2017）。因此現代華人的生涯，除了鼓勵探索內在熱情外，亦不可忽略來自家庭與社會的期待，好比子女以自身世代特有的職業，去實踐家族傳承的價值觀，便是一種具有現代華人文化特色的生涯樣貌（胡珈華，2019）。

二、婚姻

婚姻關係在以家為本的華人文化中，有著強烈的功能性意涵。儒家視婚姻為組成家庭的根本，家庭則是社會秩序的基礎，因此婚姻裡：繁衍後代、賢內助分擔家事、孝道實踐等社會功能顯得格外重要。依著此核心，不難理解傳統中華文化在看待婚姻時，會重視夫妻的生育功能；且為了維持婚姻家庭的穩定，勸和不勸離的思想也被大多數人接受；許多常見的俗語，也能窺見傳統文化中對婚姻的信念，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范嵐欣，2009；許詩淇、黃曬莉，2006；劉錦賢，2007）。

相比來自西方的婚姻觀，更重視兩

人的關係品質，如：情感連結、平等互惠、性生活滿足等；當關係中出現衝突，因為更重視個體的自主性多過於忍讓犧牲，促使離婚的觀念也更被接受（李良哲，1999/2000；利翠珊，2006；利翠珊、蕭英玲，2008；張思嘉，2006）。

而在世代的變動下，婚姻觀也一樣經歷著東西方思想的碰撞。2006年以20對夫妻進行的研究調查中發現，在決定踏入婚姻關係的條件裡，來自西方的戀愛觀已備受重視，像是：是否能在關係中依然保有個人的主體性、兩人互動關係的品質；不過，幾項深具傳統性的價值觀也依然存在，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奉養父母，求賢內助」、「姻緣天注定」等（謝文宜，2006）。一項針對現代臺灣夫妻角色義務的研究也指出，男主外女主內的想法已式微，夫妻雙方不管在對外的經濟來源，或是對內的家務、養育子女都在意共同承擔，也認為婚姻中的「關係經營」是重要的義務，這是傳統觀念中不著重的；然而「丈夫為主要的經濟來源」以及「妻子應該與公婆和平相處」這些核心責任在研究中仍顯著呈現，依舊保有傳統華人婚姻觀在性別角色上的期待（張思嘉等人，2018）。從上述研究顯現的雙文化狀態，可猜想在婚姻中會出現的衝突，如：是否該為了維持家庭完整，而留在已失去感情連結的婚姻關係中；或是更重視平等關係的妻子是否還願意遵從傳統，過年回夫家團聚等等（陳秉華、游淑瑜，2001）。

三、家庭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和萬事興」、朱子治家格言，家庭

在華人社會中被視為一切的根本，學者在構念華人文化的特性時，也認為「家族主義」是很重要的要件。傳統的華人家庭，融合儒家精神與父權社會，家庭文化的樣態便有重視成員和諧、強調角色責任、父子軸的特性；另外孝道、倫理、家規等充滿規範色彩的原則也充盈其中。學者歸納出臺灣的家庭文化中具備以下特徵：家族主義、父權的與階級的家庭結構、兩性在婚姻與家庭中的角色與行為、婆媳關係、孝道倫理、親子教養觀、和諧與面子文化（王叢桂、羅國英，2009；范嵐欣，2009；陳秉華、游淑瑜，2001）。

在個人取向的西方文化裡，以心理學領域來說，關注家庭的速度遠遠晚於關注個人，顯示西方工業社會是由於過於強調個人發展，以致家庭功能解體，此時才跟上腳步把焦點移至家庭（張思嘉，2006；趙文滔，2017）。而家庭存在的意義，在東方，可能就是一個人一生努力的目標；對西方來說，則更像是輔助個人自我實現的推手，好的家庭，是能使家庭成員健康的追逐個人目標（Heine, 2001）。

華人的家庭文化讓個人有許多的「規矩」要遵守，而西方則盡可能要讓個人自由發展，如此迥異的文化相撞，便是現代華人的處境（陳秉華、游淑瑜，2001）。以臺灣北部24個家庭進行的研究發現，利用家庭成員的成就與賢德來彰顯家道興盛、透過要求成員自我忍耐、順從長上以達成團結和諧等價值觀，仍深受重視；而1980到1990年間以大陸、香港、臺灣地區的家庭進行的調查，則反映傳統的家庭觀像是父子軸、男尊女卑的內涵已漸被削弱（陳舜文，1999；葉光輝等人，2006；Yang, 1988）。

又例如孝道精神，普遍來說不讓父母擔心、為父母揚名、禮遇父母等價值仍受重視，但為父母留後、順從父母等想法，卻已不被年輕一代所認同；而當家庭出現衝突，會有抗議行動的嘗試，試圖展現西方思維中表達自我聲音、溝通對話的價值，然一旦對方展現權威性的說教與說服時，隱忍、陽奉陰違等「疏離式的和諧」則會隨之而來，學者便提及這仍帶有傳統華人遵從家庭和諧、維護權威面子的信念色彩（李美枝，1998）。由此可見，面對部分傳統家庭價值觀仍存在，部分已式微的現況，如何在不同的典範中適應，便是助人工作者需與來談者共同摸索回應的。

肆、雙文化下的諮商模式與技術應用

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看見在現代華人社會下經歷到的心理衝撞，因此也紛紛運用創意與彈性，提出許多不同於單一西方模板的諮商模式。以下整理數位學者的建議和理論，並與前述的現況做呼應（曾文星，1996；趙文滔，2017；Hwang, 2009）。

一、C-U-C生涯決定模式

融合西方諮商架構與東方智慧的C-U-C生涯決定模式，由臺灣學者金樹人提出。C-U-C三個字母分別代表為三個階段：Consciousness（意識）、Unconsciousness（潛意識）、Compromise（折中），意指在第一階段進行理性分析，透過盤點個人的優劣勢找出合適選擇，此為西方生涯諮商經典的介入模式；然而作者觀察到許多案主在縝密的盤點後，仍遲滯不進，於是融合進東方哲思中的直觀合一

的概念，第二階段指引案主透過靜坐、共時性、生涯幻遊等技術從直覺中找靈感；第三階段則將這些新的理解放進現實情境中做整合，強調中庸和諧的精神，並使用心理位移書寫，在不同的位格中調和各個觀點，做出安頓所有聲音的選擇（金樹人，2010）。

以研究案例說明，案主在測驗中看見自己藝術型、社會型高的興趣取向，即第一階段以理性分析的方式歸納出優劣勢，然而案主同時覺察到家中母親與姊姊更偏向事務型，為了能獲得家人肯定，案主也漸漸認同保守、變化性少的價值觀，兩種價值觀的衝突，讓案主無法純然以興趣測驗的結果做職涯選擇；在諮商期間，案主的生涯選擇多次擺盪於自我實現與安定生活之間；在一次返家途中拿到徵人宣傳單，其決定跟隨直覺應徵一份輕鬆安穩的印刷店工作，當案主做出此決定後，整個人放鬆與自在的樣子，與過往有很大的不同（巫文亭，2010）。

二、人我關係協調理論

由臺灣學者提出的人我關係協調理論，因為看見現代華人的衝突常發生在獨立我（個人自我）與相依我（關係自我）需求矛盾之時，因此在與伴侶、家庭工作時，有三大部分為諮商介入的目標：1.增進個案對自身的覺察；2.增進個案對關係他者的覺察；3.找出自我與他者間需求兼顧的方法（陳秉華等人，2008；Chen, 2009）。

陳秉華等人（2009）的研究中，一對參與研究的伴侶，在處理信仰衝突議題時，反映出這個歷程。在這個案例中，女友希望帶領男友參與教會活動，但殷切的邀約使男友有時想拒絕，而一

旦拒絕，男友又擔心女友生氣，女友也經驗到失落、憤怒。覺察的發現來自於女友理解此番積極邀請的背後是希望男友能接受自己的信仰，但看到男友勉強的樣子，自己也很難受，於是決定接受男友暫時還未準備好的狀況；而當女友給予男友更多空間和理解後，男友的狀態便有所鬆動，表示其實是願意多了解對方信仰，但需要按照自己的步調，雖此刻不想上教會，但會嘗試閱讀基督信仰的相關書籍（陳秉華等人，2009）。

三、含攝文化下的Bowen家族治療

經典的Bowen家族治療理論中，「自我分化」為核心概念之一，其強調健康的關係是能明確劃分自己與他人的情緒需求，各自負起情緒責任；然在重視孝道倫理的家庭文化中，子女要與父母「分化」是不容易的，因此研究者提出含攝華人文化下的Bowen取向作法（李岳庭，2018）。

以婆媳衝突為例，婆婆數落媳婦的手藝，認為自己比媳婦更了解兒子，媳婦在被比較的動力下倍感壓力。以Bowen理論解釋：婆婆未能處理個人的情緒焦慮（媳婦會瓜分掉兒子對自己的愛），且將焦慮傳遞給媳婦。傳統的介入重點會放在提升媳婦的分化能力，讓思維理性成為主要系統，對婆婆的情緒畫出界線；然一旦納入孝道文化的觀點後，細緻的調整則是：媳婦仍須覺察被婆婆的焦慮情緒影響，但接著是試圖安撫婆婆的焦慮，例如：讚賞婆婆對先生的照顧，強調先生永遠是她的小孩，母子的親密並不會受媳婦的加入而影響等等，使婆婆的焦慮情緒得以緩和，數落的行為消失，同時不違背孝道精神（李岳庭，2018）。

四、結合「易經」的動機式晤談

動機式晤談在1983年被提出，強調讓個案覺察其動機與行為間的矛盾，引發個案看見不一致，並促使個案承諾改變（陳偉任等人，2015）。

在學者進一步解析後，發現其與西方「個人主義」有很大的關聯—由自身發出行動，解決矛盾衝突；但在華人文化中對矛盾的解讀，並非兩股相抗衡的力量，而更像是一個整體，如：太極圖中的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重視的是調和兩者。因此如何含納文化特性，但仍促使個案有所改變，學者認為同樣在《易經》中對於「命」與「運」的哲理，會是更合適的切入。華人相信盡人事聽天命，於是與個案一同整理困境中，哪些是天註定的「命」，哪些是個人修為可控制的「運」，更有機會提升動機，實際執行改變（陳偉任等人，2015）。

綜合上述列出的新興諮商模式，可見這些經典的西方理論開始有了挪動：仍重視自我覺察的提升，但覺察後如何回應環境，則納入了華人傳統重視關係和諧、面子文化、服從命運等信念，使得行動計畫有別於教科書上的指導，卻能使個案更安適於生活脈絡中。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雙文化—傳統性與現代性的觀點切入，解釋當今華人文化的概況，雖然兩種文化的成份比例又依個人所處的脈絡、教育程度、年齡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但大多同意現代華人是生活在雙文化特性下的。而諮商工作的目的，即是幫助來談者有能力回應生活中的挑戰，因此本文羅列在常見的諮商議題

中，受雙文化影響下的樣貌，像是生涯議題：想要回應家人期待，但又在意自我實現；婚姻議題：年紀到了就應該要結婚，但同時也渴望伴侶的選擇是基於有真實情感的連結；家庭議題：仍受家族的和諧面子禮儀等規矩影響，但又希望個人的獨立性得以被尊重。

面對兩種典範的碰撞，實務工作者不再全盤挪用傳統的西方諮商理論，而是運用創意發展出本土化的改良版：如C-U-C生涯決定模式中，整合經典的西方生涯諮商優劣勢盤點，與東方的機緣觀、中庸觀；或是人我關係協調理論中，不僅要協助個人增加自我覺察，也要幫忙當事人看見關係中他者的需求；在處理家庭議題時，含攝文化下的Bowen家族治療，仍運用情緒分化的眼光解析家庭衝突，但回應衝突的方式則納入了孝道、面子文化；或是處理個人改變動機不足的動機式晤談，結合了「易經」的命運觀，從「盡人事」的信念促發個案展開行動。

從對雙文化的認識可發現，現代華人在定義何謂「好的生活」、「舒服的人際關係」，仍與西方價值體系不完全相同，而新興的諮商模式試圖以加法的態度兼容並蓄，提醒實務工作者需經常對理論知識進行反思，避免當來談者生活世界所遵信的健康圓滿與理論不相符時，即評斷為不健康的、需改變的（林幸台、王智弘，2018）；一旦輕忽來談者的脈絡，則可能加劇其在生活中的矛盾與不適。因此在雙文化下的實務工作者，需不斷精進學習，替來談者打造客製化的協助，發揮創意與彈性。

以下針對此主題提供幾點在實務及研究上之建議：

一、實務上

1.工作者需覺察自身如何受雙文化狀態影響，觀察在不同情境、角色下雙文化的比重，反思身處的脈絡、認同的程度、因應的方法等。

2.養成反思諮商目標、技術與步驟的習慣，避免僵化地吸收理論，要能敏感於個案所定義的自在與適應，並回頭挑戰理論中的指引。

3.積極進行文化學習，例如：閱聽不同文化生活的文本、與不同文化中的人交流、或直接參與具代表性的文化活動等，來增加看待個案的多元視野，避免以自身熟悉的文化價值對個案進行不適當的評價。

4.學習本土諮商模式，參考其他實務工作者如何回應複雜的實務情境，增拓現場工作時的處遇路徑。

二、研究上

1.新興本土諮商模式的效果驗證仍嫌不足，以目前新興模式的發表來看，大多著重在介紹理論以及少量的質性介入成果，建議若有更完備的效果驗證，結合質化與量化研究，更可以檢視合用性、推論性。

2.分析跨文化下的助人核心要素，雙文化下得見許多東方與西方思想的差異，若要回應兩種文化如何兼容並蓄、彈性搭配，若能把握其中的助人通則，以此基礎再在做延伸與變化，能使實務工作者在貼近個案現象場的同時，保有穩定的專業信心。

參考文獻

毛菁華（2015）。大學生父母支持，父母期待對生涯未定向的影響暨生涯

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果〔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王玉珍、吳清麟（2017）。成人生涯召喚量表之編製及其信效度分析。**教育心理學報**，**49**（1），1-21。

王秀槐（2015）。從「以我為榮」到「證明自己」：華人文化脈絡下知覺不同父母期待之大學生的生涯因應組型初探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37**（1），79-97。

王叢桂（1993）。三個世代大學畢業工作者的價值觀。**本土心理學研究**，**2**，206-250。

江曉珍（2012）。諮商專業工作者與個案的雙文化自我概念契合與諮商效能之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利翠珊（2006）。華人婚姻韌性的形成與變化：概念釐清與理論建構。**本土心理學研究**，**25**，101-137。

利翠珊、蕭英玲（2008）。華人婚姻品質的維繫：衝突與忍讓的中介效果。**本土心理學研究**，**29**，77-116。

巫文亨（2010）。理性與直覺的相遇—「意識—潛意識—折中」（C-U-C）決策模式應用於生涯諮商之探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李亦園（1996）。傳統中國價值觀與華人健康行為特性。見曾文星（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頁29-52）。桂冠。

李良哲（1999）。維繫婚姻關係重要因素的成人期初探。**教育與心理研究**，**22**，145-160。

李良哲（2000）。維繫婚姻關係因素的成人期差異研究。**中華心理衛生期刊**，**13**，61-87。

李岳庭（2018）。反思含攝文化下

- 的Bowen理論及其運用在華人文化中。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3，23-44。
- 李美枝（1998）。中國人親子關係的內涵與功能：以大學生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9，3-54。
- 林幸台、王智弘（2018）。臺灣輔導與諮商專業的繼承與開展本土：輔導與諮商專業發展的回顧與探索。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3，1-22。
- 金樹人（2010）。生涯決定歷程的C-U-C模式：東方與西方的融合。2010年學習、教學、與評量國際研討會：生涯發展，臺北市，臺灣。
- 洪莉竹（2002）。與諮商有關的文化議題。諮商與輔導，198，23-28。
- 洪瑞斌（2017）。「個我」與「大我」以雙文化自我觀點建構臺灣大學生生涯敘說。本土心理學研究，47，161-231。
- 胡珈華（2019）。家庭優勢對生涯召喚發展之影響經驗研究—以邁向成年之成年前期者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 范嵐欣（2009）。華人夫妻關係衝突之人我關係協調諮商改變歷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 高旭繁（2008）。華人在傳統與現代生活情境中的傳統與現代行為：人境互動論的觀點〔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 高旭繁、楊國樞（2011）。華人心理傳統性與心理現代性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彰師大教育學報，19，3-13。
- 張思嘉（2006）。家庭與婚姻：臺灣心理學研究的現況與趨勢。本土心理學研究，26，3-34。
- 張思嘉、許詩淇、李惟新（2018）。「新好男人」、「新好女人」？當代華人婚姻關係中的角色義務。本土心理學研究，50，209-261。
- 許詩淇、黃曬莉（2006）。「情同母女」之外：婆媳關係的多元和諧。本土心理學研究，26，35-72。
- 陳秉華、李素芬、林美珣（2008）。諮商中伴侶關係的自我協調歷程。本土心理學研究，29，117-182。
- 陳秉華、林美珣、李素芬（2009）。人我關係協調之伴侶諮商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0（3），463-487。
- 陳秉華、游淑瑜（2001）。臺灣的家庭文化與家庭治療。亞洲輔導學報，8（2），153-174。
- 陳偉任、夏允中、陳冠旭（2015）。矛盾轉化：結合「易經」人生哲學於動機式晤談法的矛盾轉化歷程。臺灣心理諮商季刊，7（2），1-19。
- 陳舜文（1999）。「仁」與「禮」：臺灣民眾的家庭價值觀與工作態度。應用心理研究，4，205-227。
- 陸洛（2003）。人我關係之界定—“折衷自我”的現身。本土心理學研究，20，139-207。
- 陸洛（2011）。現代華人的雙文化自我與雙重陷落。本土心理學研究，36，155-168。
- 曾文星（1996）。文化、心理與治療。見曾文星（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頁3-26）。桂冠。
- 楊國樞（1994）。傳統價值觀與現代價值觀能否同時並存？見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科學觀點（頁65-119）。桂冠。
- 楊國樞（2004）。華人自我的理論分析與實徵研究：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22，11-80。
- 楊國樞、劉奕蘭、張淑慧、王琳（2010）。華人雙文化自我的個體發展階段：理論建構的嘗試。中華心理學

- 刊, 52 (2), 113-132。
- 葉光輝、黃宗堅、邱雅沂 (2006)。現代華人的家庭文化特徵：以臺灣北部地區若干家庭的探討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 25, 141-195。
- 趙文滔 (2017)。運用在地文化進行家庭治療：文獻回顧與實務反思。見陳秉華 (主編), 多元文化諮商在臺灣 (頁297-324)。心理。
- 趙君綺 (2008)。從華人雙文化自我角度驗證性別與世代在幸福感來源上的差異〔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東吳大學心理學系。
- 趙育玄 (2006)。大學生的職業生涯決策模式〔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 劉錦賢 (2007)。儒家之婚姻觀。興大中文學報, 21, 83-120。
- 賴樂山、高尚仁、許馨尹 (2005)。華人傳統人格與心理健康表現之相關：以“中國人個性測量表”為工具。應用心理研究, 27, 81-110。
- 謝文宜 (2006)。為什麼結婚：國內將婚伴侶婚姻承諾考量因素之探討。中華輔導學報, 20, 51-82。
- Brindley, T. A. (1990). Socio-psychological valu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I).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XV(43), 1-16.
- Chen, P. H. (2009). A counseling model for self-relation coordination for Chinese clients with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7(7), 987-1009.
- Heine, S. J. (2001). Self as cultural product: An examination of East Asian and North American sel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9(6), 881-905.
- Hwang, K. K. (2009).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in contemporary Confucian communitie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7(7), 930-943.
- Leong, F. T., & Chang, W. C. (2003).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Traditionality/modernity as a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direction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1), 1-4.
- Ratts, M. J., Singh, A. A., Nassar-McMillan, S., Butler, S. K., & McCullough, J. R. (2016). Multicultural and social justice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Guidelines for the counseling profession.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44(1), 28-48.
- Yang, C. F. (1988). Familism and development: An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mainl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D. Sinha & H. S. R. Kao (Eds.), *Social values and development: Asian perspectives* (pp. 93-123). Sage Publications, Inc.
- Yang, K. S. (1996). The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result of societal modernization. In M. H. Bond (Ed.),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pp. 479-49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C., Dik, B. J., Wei, J., & Zhang, J. (2015). Work as a calling in China: A qualitative study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3(2), 236-249.